

# 绪 论

## 第一节 旧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后开始发展。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企业相继出现；中国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方式诞生。原来完全以个体生产为基础的中国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首先，外国在华资本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并最先建立起来而且在长时期内是它的主要部分。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凭借和清政府订立的许多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种种特权，对中国的贸易额大为增长，为贸易服务的外资企业先后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建立起来。截至一八九四年，外国企业在华的投资总额合 21370 万元，<sup>①</sup> 其中金融业、航运业、商业占 74.7%，工业（制造业、公用事业）占 25.3%。工业，也主要是为贸易服务的，如砖茶制造、缫丝和为其他出口商品加工、打包等业，其资本也是从属于外国洋行或轮船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出售商品的生产企业很少，投资额都不大。但它是

史料中的货币单位有外币，中国货币单位也是“两”、“元”并用，本文均折合为“元”，以便比较。

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使用机械动力生产的近代企业，对于后来中国洋务派官僚和民办企业的出现起着刺激作用。

其次，是清政府洋务派官僚创办的企业，最初创办的是军用工业。随后由于军用工业供应燃料、材料的需要，也是为了获取利润增加财源，又以官督商办，招纳商股试行官商合办的形式吸收民间资金，陆续创办了轮船、煤矿、冶铁、纺织、铁路、电报等民用工业。

中国第一家近代煤矿、第一家近代纺织厂、第一条实用铁路都是洋务派在这时创办的。

洋务派所办的企业，除轮船业外，无论投资数量或企业规模都比当时外国在华企业大得多。这时的重要产业如机器制造、采矿、铁路、钢铁等都是中国人自筹资金创办的；而外国资本投资于这些关键性产业都是在中国人创业二十年以至三十年之后。外国资本在这里并没有起什么先驱者或“示范”的作用。

再次，民族资本即民办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企业和洋务派官僚资本企业之后。

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对外贸易的增长、国内市场的逐渐扩大和外国在华企业高额利润的刺激，中国民办企业逐渐兴起。

最先出现的民办企业也是为对外贸易服务的行业。例如，外国船舶远航来华，例需修理，因而出现民办的船舶修造业；因为生丝的大量出口，因而出现了机器缫丝业。

轮船运输在中国出现时就为外商所垄断。当时经营轮船风险大，因而利润极高，这就引起中国商人的垂涎。他们先是在外国轮船或轮船公司搭股，然后集资买船。

继船舶修造业、缫丝业之后，有火柴、造纸、印刷等业兴

起，都属小厂。进入九十年代设厂增多，并有轧花、棉纺织厂的创办，投资较大。但比之洋务派的企业，仍属小厂，技术设备亦多因陋就简。但是民办企业的厂数多于洋务派的企业。单就制造业说，民办企业的投资合 1607 万元，超过洋务派对制造业的投资（1561 万元）。

一八四〇至一八九四年，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创建时期。在这个时期，包括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在内的产业资本的投资总额约合 12155 万元，其中，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共计为 6749 万元，占 55.5%，外国在华资本 5406 万元，占 44.5%。中国资本超过外国在华资本。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消长变化和对立统一中逐步演进的。在三种不同形态资本的这种关系中也显示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又发展不足的部分原因。

### 一、外国在华资本

一八九五（甲午）年以前，中国产业资本中是中国本国资本占居优势，甲午战争后外资涌进，情况大变。

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他们对中国的侵略，由商品输出为主转为以资本输出为主。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取得了设厂、开矿筑路的特权，外国在华投资迅速扩张起来，其来势甚猛。在一八九五至一九一四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个时期，外国在华资本由 5406 万元增至 102125 万元，增长了 18.9 倍。它在中国产业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一八九四年的 44.5% 上升到 57.2%。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力东顾，在华投资增长有限，但在战后的一九二〇至一九三六年间，外国在华的产业投

资又有迅速的增长，由 133000 万元增至 571758 万元，在中国产业资本中所占比重由一九二〇年的 51.6% 上升到一九三六年的 57.8%。不过，这时期外国资本的增长主要是“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以掠夺资源为目的的投资，在关内增长不多。一九三六年，关内产业资本总额有 554593 万元，其中外国资本 195924 万元，占 35.3%。

外国在华的产业投资只是它对中国投资的一部分。例如到一九一四年的投资总额 42.56 亿元中，约有一半（21.51 亿元）是对中国政府的贷款，约 6% 是房地产投资，约 43%（18.46 亿元）是企业投资。企业投资的分配是：金融、贸易业占 45%，铁路、轮船占 35%，工矿业占 20%。这表明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基本性质是“商”而不是“工”，即金融、贸易的投资占最大比重，其次是轮船、铁路的投资。外国资本长期垄断着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并通过买办的商业控制着中国市场。外国银行垄断着中国的外汇，操纵中国的货币和金融市场。在产业部门的投资虽然不多但却很集中，掌握了交通和资源、能源等关键产业。中国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关系，从经济上说，是一个市场上中小资本和垄断资本的关系。金融、贸易和关键产业被外国资本掌握，中国资本对外国资本的依存性和其自身发展前途的局限性就很大了。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片国土沦陷，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的殖民地。在抗战后方的外国在华资本的直接投资已微不足道，外国借款数量则空前增加。战时外债除一小部分用于军需品的直接供应外，其他都用于维持因通货膨胀而陷入困境的货币金融体系。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接管了英美等国在中国沦陷区的企业和房地产。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日本的全部和德、意法西

斯的在华财产被中国政府接收；原属于英美等国财产则发还原主。战后，欧洲各国都没有扩大海外投资的能力，在中国的外国资本中是美国一家独霸的局面。

## 二、官僚资本

从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权，先后有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或国营、公营的企业。它们的性质前后有所不同，但都是与官方、官僚联系密切而不同于民间资本的一种资本形态。这种企业有官款支持，政权保护，它大手大脚，低效益、多冗员，官僚主义十足的特点是始终一致的。

清政府洋务派在甲午战争前创建了一批近代工厂，规模大于当时的外国在华企业，是一项历史功绩。但由于决策失误、用人不当和经营腐朽，导致不少企业破产。甲午战争后，它的军事工业除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颇有发展外，其余大都是勉强维持残局以至停歇。民用工业则有发展，如在对江南船厂、汉冶萍公司、轮船招商局等企业实行扩建的同时，兴起一个借外债筑铁路的高潮并开始创办银行。

兴建铁路，是以张之洞、盛宣怀为主干的后期洋务活动的一大业绩。十二三年间修筑了 4300 余公里的铁路，超过同时期外国人在华所筑里程，也超过后来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所筑里程。旧中国的铁路干线于此时奠定基础。

张之洞等确有兴办铁路的热情，但他只许官办不许民办。他说：“铁路为全国利权所关，不甘让利于商，更不肯让权于商。”<sup>①</sup>原来从一九〇五年起，兴起一个民办铁路的高潮，各省份纷纷设立铁路公司，绅商募集的铁路资金不下 6000 万元，是民

<sup>①</sup>《张文襄公全集》卷 42 页 23。

族资本的一笔空前聚集。张之洞、盛宣怀却不加引导而建议清廷谕令将民办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官僚资本只求自己独占，不能利用社会积累，敌视民间兴办事业，阻碍着中国经济事业的发展，成为近代化过程中的一大消极因素。

开办新式银行，是洋务派在这时期的一项创举，但它注重于银行在财政方面的作用。这时各省纷纷设立的官钱局更主要是为了财政的目的。官僚资本从此以开办银行为首要任务，后来的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都是这样。

洋务派官僚资本至辛亥革命前都还有相当的发展，它所有企业的资产值，一八九四年约合 0.48 亿元，一九一一年增为 5.23 亿元，扩大了十倍，主要是由于修筑铁路的结果。至一九一一年官僚资本的全部投资中，工业占 16.1%，交通运输业占 75.3%，银行占 8.6%。但是，这时支持它发展的已不是清王朝财政而是外国借款了。占投资最大比重的铁路，90% 是借外债修建的。

北洋政府时期的官僚资本，主要是接办洋务派的事业，北洋政府库贫如洗，自身很少创建。不过，这时期的官僚资本仍有增长，到一九二〇年共达 9.02 亿元，比一九一一年增加 72% 强。增长最快的是银行，次为邮电，再次为工业和铁路。它的发展更是依赖外债了。

官僚资本在发展过程中都企图实现独占和垄断的目的，但洋务派和北洋政府所办企业都还没有具备这种力量。

北洋政府继承后期洋务派的发展路线，注重发展银行业，试图建立金融垄断。但这个政权风雨飘摇，未能成功。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建立南京政权后才走上由金融垄断到工业垄断的道路。

国民党政权的前十年致力于财政，财政收入增大了十倍，这就有可能使它在一九三五年的“银行风暴”中一举攫取了中国、

交通两家全国最大的银行和另外三家商业银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币值改革，使国家银行独占白银储备和货币发行权，从此实现了金融垄断。

国民党政权以前的历届政府借外债修建铁路和电信设施，使之原来的官僚资本已在交通运输业中占有垄断地位，国民党政权接收了这些事业。

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工业垄断活动，是从一九三五年成立资源委员会开始的。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进展并不顺利。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获得的外国借款几乎等于自清政府举借外债以来 84 年的总和，但都用于军事和维持外汇汇率与法币，很难投资工业。不过它已在钢铁、机器、电器、棉纱生产上占有垄断地位了。真正的工业垄断，是国民党政府在战后接收了巨额的日伪产业，辅以日本赔偿和归还物资才完成的。而这些日伪产业以及收复的交通运输业的恢复和营运，几乎全是依靠美援，包括美国贷款、剩余物资、救济物资和美国顾问。这时候，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上全靠美国支撑，它的国家垄断资本，实际上是美国支配的资本。

过去的官僚资本没有实现的国家垄断，国民党政府实现了。

在全国近代工业和交通业资本中（包括外商资本）官僚资本所占比重：一八九四年为 39.1%，约 0.48 亿元；一九一一年降为 26.8%，约 4.78 亿元；一九二〇年再降为 26%，约 6.7 亿元。进入国民党政权后，一九三六年增长到 35.9%，约 19.89 亿元（不包括东北）；战后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陡增至 64.1%，折战前币值约 42 亿元。

在全国金融业中（包括外商资本），一八九四年还没有官僚资本；一九一一年官僚资本仅占 6.3%，约 0.45 亿元；一九二

○年占 16%，约 2.33 亿元。进入国民党政权后，一九三六年上升到 58.9%，约 5.64 亿元（不包括东北）。战后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更增至 88.9%，可谓登峰造极。不过，在恶性通货膨胀下，银行已外强中干，其资产折战前币值仅 3.44 亿元。

国民党的国家垄断资本，不是像欧美国家那样以通过财政金融手段干预和调节国民经济为主，而是继承洋务派、北洋政府官僚资本的老传统，采取国营、国营企业的形式直接经营企业（也有少数以私营面貌出现的豪门资本企业）。这种形式的国家垄断资本具有直接的排他性。这种国家垄断资本的形成就堵塞了民间资本即民族资本的发展道路。而这种官办、国营、国营企业，由于具有一定的特权，和受软财政约束，它必然是低效率、高冗员，官僚主义十足。这种情况，清王朝、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都无改变。当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被这种浪费性的生产方式所盘据，其祸害可想而知。

不过，这种形式的国家垄断资本集中程度很高。战后资源委员会、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两大集团的资本达战前币值 9.38 亿元，占国民党全部工业资本 15.99 亿元的 58.7%，连同其他八大家企业共占 63.5%。这就是列宁所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sup>①</sup>

### 三、民族资本

民族资本也即民营资本，是三种资本形态中最软弱的资本。它既无政权保护，又无原始积累的经济基础，处在外国在华资本

<sup>①</sup>《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164 页。

和官僚资本两大资本之间，任人予取予求。但它有立足于市场，业多面广，利于从社会上积累资金，以及与传统经济关系密切等优势，是生命力旺盛的自由资本。

从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个期间，是民族资本发展最快的时期。

这段时期民族资本的发展，是中国在甲午战败后举国震动，在“设厂自救”和“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下，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爱国民主运动同步进行的。这种发展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一八九四至一九一四年间，民族资本（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由 1992 万元增至 28741 万元，增加 14.2 倍，年增长率达 13.37%，略低于外国在华资本，高于官僚资本。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二〇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出现进口减少，出口增加，金贵银贱，工业品价格上升幅度超过原料品价格和工资上涨幅度等有利于工业发展的市场因素，民族资本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被称为“黄金时代”。但这是指高利润而不是高投资。投资增长速度已较前期降低了，不过仍有两位数（11.9%）的年增长率，超过外国在华资本（4.82%）和官僚资本（3.44%）的年增长率。

从资本量看，因为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主要部分都在交通运输业，单就工矿业说，一九一三年民族资本就超过官僚资本，约抵外国在华资本的一半。到一九二〇年，民族资本约有 4.51 亿元，为官僚资本的 3.9 倍，直接追比外国在华资本（约 5 亿元）了。

在交通运输业方面，当时的民办电报局是民办事业中最成功的一个，一九〇六年被清政府收归官办；随后兴起的民办铁路，一九一二年被袁世凯收归国有。从此，除轮船外，民族资本只能

向工业发展。

在轮船业中，民族资本始终保持 18—19% 的年增长速度，是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所不及的。到一九二〇年，民族资本在轮船业的投资约 0.8 亿元，为官僚资本轮船业的 3.6 倍，与外国在华船只的投资（约 1 亿元）也相差不多。

进入三十年代，民族资本的发展进入困难时期。因为“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使民族工业丧失了 15% 的市场；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又以民族工业所受打击最甚。不过，这时已有相当基础的民族资本还有 8.21% 的年增长率，专就工业来说，达 9.37%。高于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增长率（均不计东北）。到一九三六年，关内的民族工业资本有 14.48 亿元，为官僚资本的 4.3 倍，与外国在华工业资本（14.51 亿元）相当。连同东北华人资本共有 18.89 亿元，成为历史上民族资本的最高峰。

民族资本具有立足于市场竞争的生命力，在抗日战争前聚集的工业资本超过官僚资本，成为这时期聚集资本的主力军。但是，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为外国在华资本和官僚资本所控制，民族资本的发展，越到后期越被局限于工业，主要是轻工业。

在发展的地域方面，民族资本在初步发展时期，曾有走向内地原料产地和农村经济结合的趋势，但由于中国社会殖民地性质的加深，这种趋势中断了。全国工业的地区分布，按企业职工人数统计：一九三三年，40.8% 集中于上海、天津、广州、青岛四市，其中 31.1% 在上海。到一九四七年，这四个城市的工业占全国的 70.2%，上海一市即占 53.8%。就是全国一半以上的近代工业集中在上海一市。中国工业发展的地区局限性极为突出，这就是以口岸、租界为基地的半殖民地型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

是越走越窄的。而当官僚资本完成了国家垄断以后，民族资本就完全没有出路了。

抗日战争时期，大片国土沦陷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沦陷区的不少民族工业企业迁移到后方，支援抗战，但并没有得到发展。因为国民党政权实行经济统制政策，官僚资本肆意扩张，噬人而肥。估计后方的工业资本中官僚资本占 51.8%，民族资本占 48.2%。在主要产品的产值中，民营工业所占比重由一九三八年的 78.8% 降为一九四四年的 46.3%，国家垄断之势已成。不过在轮船业中，按吨位计，民营仍有 60% 的优势。到抗战胜利后就不同了。一九四七 / 一九四八年，民营工业资本仅恢复到战前一九三六年水平的 78.6%，约合战前币值 14.85 亿元；官僚资本工业则增至战前水平的 2.8 倍，约合战前币值 15.99 亿元。在主要产品产值中，民营工业仍占 73% 的比重，那是因为国营、公营企业开工率低、经营腐败所致。在轮船业中，民营丧失了优势，按吨位计，退居 48%。这时候，国民党的国家垄断资本已与美国贷款和各种形式的美援合流，其他外国投资已不占重要地位。估计一九四七 / 一九四八年，全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资本中，外国资本占 11.2%，官僚资本占 64.1%，民族资本占 24.7%。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民族资本不可能发展了。

一九四七年七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全国规模的进攻，国民党政权的军队节节败退。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开始瓦解，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所代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陷入困境，但也即将走向新生，在人民革命胜利以后，民族工业从诞生以来逐步形成的生产力基本上保存了下来，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部分，得到了发展。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因为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发展的，道路曲折，发展水平很低，力量微弱。但是，它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民族资本主义的工业、商业、金融业的发展，引进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经济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种进步，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物质前提，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的重要历史条件之一。<sup>①</sup>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政策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受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不能充分发展。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拥护的。但是他们不可能断绝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经济联系，从而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是一个动摇的阶级，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针对这个特点，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从而不断发挥了他们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积极作用，成为无产阶级较好的同盟军。

毛泽东说：“民族资产阶级，主要的是中等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跟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过革命，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掌握过政权，而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所限制。在抗

本节内容主要依据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较好的同盟者。”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爱国的阶级。在它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中，就表现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政权限制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爱国革命性。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帝国主义在中国获得设厂、开矿、筑路的特权，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治代表深痛于“经济亡国”之祸愈演愈烈，强烈要求打破官府垄断，让民间自由发展新式工业以挽救民族危亡；“设厂自救”之声遍全国。

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他们的势力范围，在中国掀起一个修筑铁路的狂潮，各省绅商纷纷设立铁路公司募集资金，自办铁路，挽回利权。从一九〇四至一九一〇年设立的民办铁路公司共有 18 家。这些民办铁路公司是爱国运动的产物。在设立公司的章程中，都标明“自保权利”；“杜外人覬觐”；“不招外股”，“不借洋债”等字句。并规定若有人购股票后转售或抵押给洋人，即将其股票作废或“罚充善举”。

这些铁路公司通过各地商会募集资金约 6000 万元修建铁路。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相当于同时期全部工矿业投资之半。可以说是民族资本的一次空前的大聚集。<sup>②</sup>

清末“新政”期间，民族工商业已有一定的基础，清政府办商会，第一个成立的是上海商务总会，一九〇四年天津商务总会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40 页。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77 页。

成立。以后许多大中城市也成立了商会，它们在抵制洋货、收回利权的爱国运动中都有积极的表现。一九〇五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就是由上海商会发起，通电二十一处商会开展起来的。

一九〇四年，美国与清政府于一八九四年签订的十年禁止华工入美条约满期，美国要求续约，在美华侨反对，呼吁废约，国内响应，群情激愤。一九〇五年五月十日，上海商务总会召开特别会议，决议：“以两月为期，如美国不先将苛例删改而强我续约，则我华人当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七月，发出抵货通电。这是中国第一次有组织的抵制洋货运动，规模壮阔。各地纷纷组成“却约会”、“争约处”、“抵制美约社”等团体，商界号召不订、不买、不装、不运、不卖美货，工人、学生和舆论界都投入运动。

清政府对抵货运动采取严禁态度，于八月三十一日发布上谕“从严查究”，并两次电令两江总督周馥严惩曾少卿（上海商会议董、抵货案提议人并领衔通电抵货）。曾只得发表“留别天下同胞书”而退出运动。但称：“愿少卿死后千万曾少卿相继而起”，“有与列强并峙大地之一日”。

在工商界内部，对抵货运动有不同看法，但总的说是积极的。抵货运动声势浩大，清廷终于不敢与美国续约。<sup>①</sup>

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思想就是“实业救国论”。作为一种理论是错误的，但办实业是为了救国的指导思想是可贵的。所以毛泽东在五十年代谈到中国工业发展时说：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35、637页。

东；讲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sup>①</sup>

自鸦片战争以来，不少有识之士和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先进人物，为了发展工业、建设国防，求得祖国的富强，曾作过坚韧顽强的努力。他们虽然在某一时期和某一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大都归于失败，更谈不上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但他们所作的努力是值得后人尊敬的。

但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不可能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而且常常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抱有幻想。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当政后，他们就曾希望国民党统一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只是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大片国土沦陷的事实出现以后，他们才觉醒过来，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通称为“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号召后，全国人民热烈响应，纷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一九三六年五月，全国救亡团体联合成立中华全国各界联合会，简称“救国会”。这是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组织，但像银行家章乃器也是它的领导人之一。

许多实业家更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战争。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约有六百余家上海、江苏、浙江、武汉等地的民营工厂迁到后方，支援抗战。这是民族资产阶级爱国史上的一次壮举。

工厂内迁，最初是国民党政府倡议的，并指派官员林继庸等

徐盈：《毛主席说，有四个人不能忘记》《纵横》1984年第3期全国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编。

人负责筹办。各地的许多企业家响应并积极行动起来，把他们的工厂迁到后方。

上海迁厂时日本侵略者已发动“八·一三”战争。上海企业家颜耀秋、胡厥文、支秉渊、吴蕴初等，为迁厂事克尽辛劳，成为迁厂的领袖人物。当时敌机肆虐，职工冒险拆迁，时有人伤亡。而重要交通工具优先供军用，工厂器材主要靠木船运至镇江，再装船去武汉，损毁不少。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沦陷时，共迁出 146 家，技工 2500 人，器材安抵武汉 1.46 万余吨。迁聚武汉的工厂，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已有 64 家临时复工承制军需订货。至六月，武汉垂危，又有第二次大迁移。这次迁移，包括各地迁来武汉的工厂约 170 家和武汉本地的工厂约 150 家。

这次迁移，卢作孚和他的民生轮船公司作出很大的贡献。在迁移过程中，由于武汉沦陷，积压在宜昌待转运到四川的人员有三万人，机器设备九万多吨。民生公司投入二十二条轮船运送。当时川江水枯，大船难行，又有敌机轰炸，十分艰险。卢作孚指挥民生公司职工晚上装船，昼伏夜行，只用了四十天就运走了全部人员和三分之一的物资。民生公司在本次抢运中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一百名职工献出了生命，六十多人致伤残，十六条船被敌机炸毁。<sup>①</sup>

内迁工厂大部分迁四川，部分迁湖南、广西、陕西。

内迁工厂数量虽不多，但对于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后方来说，这十余万吨的新式器材和万余名的熟练技工，立即成为发展

梁孝鸿：《卢作孚》，见《中国著名爱国实业家》，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65 页。

工业的骨干力量。这些厂的资方和技术、经理人员，大部分有专门学识和经验，又具有爱国热忱，迁厂后都迅速复工，努力生产。如余名钰创办的大鑫钢铁厂，迁重庆后与卢作孚合作，改名渝鑫钢铁厂，成为后方最大的民营钢铁厂。范旭东、侯德榜组织入川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二百余人，在四川建立化工和科研基地，实验完成举世闻名的侯氏制碱法。胡厥文迁新民机器厂、合作机器厂于重庆，复设厂于湖南、广西。颜耀秋任迁川工厂联合会主任五年，胡厥文继之，都为排除障碍，发展后方生产不遗余力。支秉渊以拓荒者精神，将湘南小县祁阳建成煤、铁、钢、电、机器制造的新工业区。沈鸿则将利用五金厂器材运往延安，加入陕甘宁边区机器厂，为边区生产作出重大贡献。<sup>①</sup>

在国外的侨商同样表现了支援祖国对日抗战到底的热情。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加坡成立了以陈嘉庚为主席的筹赈会和南侨筹赈总会，先后募集了三亿余元支援抗战。陈嘉庚本人每月捐献二千元，直到抗战胜利为止。

欧美侨商也组织了救亡团体进行抗日宣传，并筹款筹物救伤兵、难民，组织青年回国参军抗日。<sup>②</sup>

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爱国积极性给予充分的鼓励和支持。

在武汉沦陷，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后，中共中央亦决定在重庆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局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很重视对工商界的工作。周恩来经常对南方局的工作人员说：中国民族资产

① 林继庸：《民营厂矿内迁纪略》1942年版；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199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33页。

② 前引《中国著名爱国实业家》。